

九六级党员领导干部在职研究生班

# 优秀毕业论文选

中央党校  
函授学院 空军部队分院

# 九六级党员领导干部在职 研究生班优秀毕业论文选



中央党校 空军部队分院  
函授学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 九六级党员干部在职 研究生班优秀毕业论文选

## 九六级党员干部在职 研究生班优秀毕业论文选

蓝天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984244

北京京海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315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

## 序

新世纪即将来临，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国际局势也出现了种种变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还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和困难，这就要求我国不仅要有正确经济发展战略，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为此，我们必须面对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挑战，着眼 21 世纪军事斗争的需要，全面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

加强我军质量建设，要坚持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围绕质量建设这个核心问题，深入研究军队发展战略；既要着眼于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又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军情；既注重改革创新，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又保持我军特色，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全面提高我军战斗力。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领域，已经引起了战争理论和战争形态的一系列变化。一场新的世界军事革命正在到来。我军军事战略方针也由于国际环境的发展而改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军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跟上世界军事革命发展的趋势，深入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另一方面，我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不可避免的磨擦和碰撞下，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必然会触及到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我们军队的各级干部也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

江泽民同志今年1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系统、周密地研究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决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勇敢地开拓理论和实践的境界”。面对国际和国内这些复杂多变的情况和问题,我们军队的每一名干部,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理论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武装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探讨全面加强新形势下军队建设问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空军部队分院编辑的96级党员领导干部在职研究生班《优秀毕业论文选》,是在导师指导和论文答辩的基础上,从51篇毕业论文中筛选出来的,是空军首批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研究生经过三年刻苦学习、研究的结晶。值得欣慰的是,这些成果对当前我军建设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央党校 空军部队分院研究生办公室  
函授学院**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

# 目 录

解放思想,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	李昆仑(1)
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 .....	李 振(23)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加强我军质量建设 .....	董子峰(42)
邓小平威慑防御思想探要 .....	王云杰(68)
试论知识经济时代军事教育改革问题 .....	刘 刚(86)
关于培养军队高素质人才的思考 .....	杨 耀(106)
我国空军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研究 .....	赵 勇(124)
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努力增强党委的凝聚力、 战斗力 .....	王 峰(143)
贯彻“十六字”方针,加强军队党委民主集中制建设 .....	郭学鑫(168)
论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与新的形势任务 不相适应之处及改革对策 .....	陈仕平(185)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 .....	刘振文(206)
论干部考核中的实绩原则 .....	卢 震(236)
试论新形势下我军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矛盾及对策 .....	栾建军(255)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意识建构与思想政 治教育 .....	陈学建(272)
试论邓小平新时期军事后勤思想与加速我军后勤现 代化建设 .....	司树杰(294)
试论党的群众路线 .....	方建东(317)
论面向 21 世纪领导班子的整体效应 .....	吴江浩(336)
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马继胜(358)
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面对的首要的根本问题 .....	惠章志(376)

# 解放思想，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

空军政治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李昆仑

以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起点，社会主义经历了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初步创立到全面发展的历史。在这 150 多年的风雨历程中，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高潮，也有低潮；有辉煌，也有挫折。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真理，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在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墨守成规，照搬照抄，必然导致挫折和失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坚持的前提下发展，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 一、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规定

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尤其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和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 解放思想是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前提条件。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邓

小平理论的精髓。用实事求是原则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前进和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这一论述从本质上揭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哲学的观点看，实事求是的最终目的，是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为达到这个目的，认识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作为认识出发点的“实际”，不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而是生动的、现实的、不断变化的。解放思想，正是基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在认识领域内要求不断更新旧观念，创造新理论，使人们的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达到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必须不断打破习惯势力的影响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所谓习惯势力，是指人们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行为倾向，主观偏见则是指把认识上的偏差定型化，并用以剪裁客观现实的错误见解。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往往禁锢人们的思想，产生错误的导向，是实事求是的大敌。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都以不同形式危害着我们的事业。比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小生产者心理，使不少人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愿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在“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下形成的“左视病”，使人们思想僵化，抱残守缺，凡事总是先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如果不打破这种保守片面的狭隘认识，不排除那些经验主义、本本主义的主观偏见，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客观世界的发展是永恒的，而任何正确的认识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的。在客观对象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人们的认识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就会成为达到新的实事求是的障碍。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使思想跟上实践和现实的发展变化。

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不断解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实现理论上的新突破和实践上的新飞跃。

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人们所面对的现实条件各不相同，实践的内容、范围、结果也不一样，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作用方式。如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映这些客观规律的思想和理论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是应当根据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创新和突破的结论，或者修改原有认识中与现实不符合的部分，或者补充新的认识内容，或者抛弃已经失去现实性的个别过时的结论。早在 1918 年，列宁就告诫人们，不要把社会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简单化的概念，社会主义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手段前进的，在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既产生认识的新现象，又产生表明这些现象的新原理，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正如邓小平明确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4 页）所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实践也证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因此，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

（二）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直接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过程中对客体的反映。在认识过程中，客体的本质决定着认识的内容，主体的精神条件决定着选择信息的标准和处理信息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从客体的角度，而且也从主体、实践的角度来认识世界，十分重视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马克思在谈到他的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时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就需要从主体的角度理解认识活动，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注意优化主体的精神条件。主体的精神条件包括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意志品质等，其中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尤为重要。一定的知识是加工信息的必要条件，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主体就不具备加工信息的能力。不过，知识总是在随着实践发展而更新，过时的知识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发现和获得新的知识，还会束缚人们的头脑，成为获得新知识的障碍。同时，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总要受到头脑中积淀的思维传统的制约。中国历来有唯书唯上的传统，思维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不利于吸收新思想、接受新事物。就社会主义的认识规律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所以，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要突破过时知识的束缚，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破除唯书唯上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思想不解放，认识就会停滞下来，“条条框框的东西就多起来了”；工作上就不思进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所以，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把解放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直接体现，是实事求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动力。在他看来，只有开动脑筋，大胆探索，并不断反思自己，才能避免思想僵化，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实践的发展，保持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我们的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

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它产生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推动下向前发展。有人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这说明了理论来源于实践的道理，但是不全面。人类正是依据实践，不断丰富思想和理论，才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保持常新的生活。理论只有在脱离现实生活时，才会是灰色的。思想理论脱离现实生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思想理论无视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只在纯观念中构造美妙的未来时，它便成为空泛的

幻想。空泛的幻想是无望超越现实时的自我安慰，不仅无助于对现实的改造，而且会把改造现实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另一种是当思想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而成为历史遗迹的投影时，它就丧失了思想的本来品格，不能再充当照耀和引导人类走向未来的火炬。与实践相脱离的思想理论如果被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就会成为现实生活的枷锁和实践发展的障碍。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43页）人们只有打破僵化的观念世界，从“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才能进行新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造。这时，突破思想禁区、砸碎思想枷锁、扫除思想障碍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成为社会历史前进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它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把实践的观点看作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看作实践发展的内在环节。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思想理论应该具有实践的主要品格，应该是开放的、批判的、历史的、发展的。在马克思那里，解放思想不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是理论自身的一种内在规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正因为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规定，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贯穿着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列宁主义的产生、毛泽东思想的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无一不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可以说，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事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条件。

（三）解放思想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过程，是理论突破的先导。人类的思想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人们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参与历史活动，其思想观念也必然要打上历史的印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预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都是在当时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做出的。对此，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他们多次强调自己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是在“活的行动中”“发展的理论”。所谓“发展的理论”，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理论的发展是通过思想的解放实现的，如果没有解放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就无法超越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也无法写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曾把解放思想称为“批判的武器”，指明其实质是“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这种不崇拜任何东西的革命批判精神，正是对解放思想原则的生动表述。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是比较早地以解放思想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列宁主义阶段，使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了胜利。当时，列宁为了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论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不完备和过时了的论调，明确宣布：“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同时驳斥了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教条的错误做法，强调必须以解放思想的态度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选集》新版第1卷，第274页）列宁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深入研究帝国主义，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重要结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列宁曾经指出：“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列宁选集》第2卷，第278页）在列宁看来，在新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解放思想。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并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面对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无法找到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现成答案。因此，必须反对那种“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词句，而不会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的教条主义，坚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十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两个凡是”严重阻碍拨乱反正的思想状况，十分明确地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并突出了解放思想的问题。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同时，他还十分明确地规定了解放思想的具体要求，他说：“我们讲解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邓小平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行动之中，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开辟了社会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新阶段。江泽民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解放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贯穿于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渗透于这一理论的每个具体观点之中。

## 二、解放思想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先决条件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有过三次大的飞跃和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这三次大的飞跃和发展，都是以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先导的。实践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通过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先决条件。

（一）解放思想：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理论指导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十九世纪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分析后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必然是文明国家里“同时发生”，除此之外不会有其它选择。最早明确地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恩格斯，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

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关于“同时发生”的原因,恩格斯认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1872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才能取得成功,他说:“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1892年4月,恩格斯仍然认为:“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8页)

在俄国革命的初期,列宁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才能胜利的思想,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若孤军奋战是没有胜利希望的。1905年,他在《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欧洲的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那末,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来说,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列宁全集》第10卷,第71页)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列宁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通过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研究,逐步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时发生”的论断,得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新的结论。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第554页)1916年4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

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第722页)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论,表面上看似乎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实质上却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列宁创立这一理论,靠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解放思想的理论勇气,没有这种精神和勇气,社会主义革命就只能等待在发达国家内同时进行,就绝不会有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胜利。

(二)立足于国情:毛泽东创立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由城市工人率先暴动,然后推及广大农村,最后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这条道路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准备城市起义,强调“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现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六大以来》(上)第9页)共产国际也多次敦促中国共产党将力量集中在城市,把城市无产阶级的罢工、示威等斗争形式提到首位。1930年,李立三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推行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1932年至1934年,王明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也重犯过进攻城市的冒险主义错误。一直到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带回来的仍是城市中心论,主张把党中央迁到白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错误使党的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民主革命进程遭受重大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坚决反对机械地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

相结合，并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并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他认为，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走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统治阶级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广大农村则相对薄弱。中国是一个落后农业国，决定了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作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4页）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实践结果表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理论，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为革命队伍的主力军。革命势力推展的方向是从城市推向农村；中国革命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革命队伍的主力军。革命势力推展的方向是从农村推向城市。历史证明，这两条道路都是正确的。在当时共产国际具有绝对权威、党内“城市中心论”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毅然提出和十月革命完全不同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同样依靠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解放思想的理论勇气。没有这种精神和勇气，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中国革命还将在黑暗中徘徊更长的时间。

（三）突破思想禁区：邓小平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成功地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十年“文革”结束后，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起点，中国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地进行探索和创新，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新的经验、新的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一条建